

#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周 云<sup>1,2</sup>, 刘建平<sup>1</sup>, 朱 海<sup>2</sup>, 梅 云<sup>1</sup>

(1.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昌 330022; 2. 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遵义 563006)

**摘 要:**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 678 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2)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关键词:**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 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 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多重中介模型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18)06-0557-05

## 1 引言

作为政策执行主体, 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政策的具体贯彻和落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容易出现政策执行偏差, 造成无法实现预期政策目标、损害公众利益等严重后果(丁煌, 2002)。人际归因及责任判断模型认为消极事件发生后, 人们对行为主体的责任判断决定了人们对行为主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Weiner, 2000)。由于政策执行偏差造成的后果具有消极性, 公众会自发对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各级地方政府进行责任判断。更重要的是, 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责任判断将决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结果信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 人们会根据结果信息来做出判断以及行为反应。Mazzocco, Alicke 和 Davis(2004)认为有害结果的严重程度会影响责任判断和应受惩罚判断; 结果越严重, 人们认为行为主体应当为有害结果承担更大的责任、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结果严重程度如何影响人们对行为主体的责任判断? 中间有什么样的加工机制? 相关研究表明, 人们对行为主体的心理状态判断中介了结果严重程度与人们对行为主体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Fincham, 1982; Malle, Guglielmo, & Monroe, 2014)。

心理状态判断是人们对引发行为主体行为内在动机的判断, 包括对行为主体愿望、认知状态以及信念等的判断和理解。其中, 行为的主体的愿望(desire)和信念(belief)被认为是引发行为主体行为的

主要心理状态(Flavell, 2000)。愿望判断一般涉及对行为主体的行为是否具有有意性的判断, 而信念判断涉及对行为主体是否能预见到有害结果的判断(Lagnado & Channon, 2008)。虽然 Heider(1958)的责任理论就已经提出在道德判断中愿望和信念在概念上具有差别。但是很多关于道德责任判断的研究还是将这两个概念合并在一起, 没有区分两者在道德责任判断中可能的不同作用(Cushman, 2008)。在已有将愿望和信念进行区分的研究中, 无论是单独对愿望进行操纵还是单独对信念进行操纵都可以改变被试对行为主体的道德责任判断(段蕾, 莫书亮, 范翠英, 刘华山, 2012; Laurent, Nuñez, & Schweitzer, 2015; Malle & Nelson, 2003)。

综上所述, 本研究假设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既可以通过公众的地方政府愿望判断中介作用于公众的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也可以通过公众的地方政府信念判断中介作用于公众的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构成一个多重中介模型。具体如图 1 所示, 通过对该模型的检验可以进一步了解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如何通过公众的内部加工影响公众的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并为实践中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政策执行偏差所引发的危机提供依据。

## 2 研究方法

### 2.1 被试

被试来源于江西省吉安市、新余市、赣州市三个地级市 23 所中学的学生家长。被试的选取过程为: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SH071),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4ZC309),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XLI519)。

通讯作者: 刘建平, E-mail: liujianping@jxn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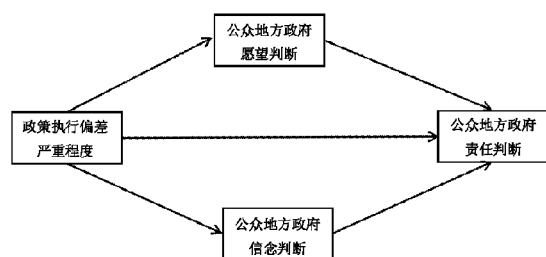


图1 多重中介模型示意图

在选取学校时按照比例大体均衡的原则选取主要生源地是农村和主要生源地是城区的中学。吉安市共选取8所学校,其中城区初中2所,城区高中2所,乡镇初中4所。新余市选取8所学校,其中城区初中2所,城区高中2所,乡镇初中3所,乡镇高中1所。赣州市共选取7所学校,其中城区初中2所,城区高中2所,乡镇初中4所。每所学校随机选取1个班的家长家长作为被试。共有678名已经步入社会并具有社会经验的学生家长参与调查。将问卷中漏选较多及选择近一年没有遇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事件的问卷剔除,回收有效问卷586份,回收率86.43%。其中男性368人,女性218人;城镇301人,农村285人;20~30岁32人,30~40岁360人,40~50岁142人,50~60岁29人,60岁以上23人。

## 2.2 测量项目

### 2.2.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事件

该问卷在对18名基层公务员及30名公众访谈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括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22种常见的民生类政策执行偏差事件。被试根据自己近一年的真实情况对问卷上所罗列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事件进行是或否的回答。

### 2.2.2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

该变量参考徐彪(2014)关于危机事件严重程度的题干和选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适合测验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2个题项,包括“当地政府没有落实好该项政策对您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等两个题项。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两个题项的相关系数 $r = 0.857$ ,信度较好。

### 2.2.3 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

该项目参考Campbell(1999)研究中关于愿望判断的题干和选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符合施测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3个题项,包括“该项政策没有落实好是当地政府不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导致”等。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三个题项的Cronbach's  $\alpha = 0.845$ ,信度较好。

### 2.2.4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

该项目参考Campbell(1999)研究中有关信念判断的题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符合施测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3个题项,包括“当地政府能预料到落实不好该项政策会对您和其他群众的利益造成损害”等。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三个题项的Cronbach's  $\alpha = 0.885$ ,信度较好。

### 2.2.5 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该变量参考徐彪、陆湾湾、刘晓蓉和张浩(2016)研究中关于政府责任判断的题干和选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符合施测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2个题项,包括“当地政府对没有落实好该项政策损害您利益的情况应承担全部的责任”等。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两个题项的相关系数 $r = 0.851$ ,信度较好。

## 2.3 施测过程

利用各中学召开家长会的时机,在班级家长会后对参会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每个班级的问卷调查由6名经过培训的大学生调查员进行,每名大学生调查员负责对6名左右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前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强调本次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和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之用。要求家长根据自己真实的想法进行回答,回答完毕后立即回收问卷,并给予家长小礼品。

##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Mplus7.2统计工具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3 结果分析

###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中通过被试自陈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问卷具体施测的过程中强调问卷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和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之用等程序控制。除了程序控制之外,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将公因子数设定为1,对“单一因素解释了所有变异”这一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下: $\chi^2 = 1142.37$ ,  $\chi^2/df = 32.64$ ,  $CFI = 0.65$ ,  $NNFI = 0.56$ ,  $RMSEA = 0.230$ ,  $SRMR = 0.104$ ;各项指标均显示模型拟合不良,不支持假设。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允许的范围內。

### 3.2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相关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如表1所示,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正相关( $r = 0.424$ ,  $p < 0.001$ )、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正相关( $r = 0.512$ ,  $p < 0.001$ )、与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正相关( $r = 0.462$ ,  $p < 0.00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

偏差严重程度与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显著正相关( $r=0.456, p<0.001$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显著正相关( $r=0.383, p<0.001$ );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与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显著正相关( $r=0.464, p<0.001$ );各变量之间相关显著,符合多重中介模型要求。

表1 各变量相关结果

变量	1	2	3	4
1.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	-			
2. 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	0.456***	-		
3.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	0.383***	0.464***	-	
4. 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0.424***	0.462***	0.512***	-

注:\*\*\* $p<0.001$

### 3.3 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温忠麟与叶宝娟(2014)以及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和孙配贞(2014)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检验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公众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检验政策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 $\chi^2=2.46, \chi^2/df=2.46, CFI=0.99, NNFI=0.98, RMSEA=0.023, SRMR=0.003$ 。如图2所示,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gamma=0.510, t=12.99, p<0.001$ )。

接下来对多重中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和表2所示,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

$\chi^2=97.77, \chi^2/df=3.26, CFI=0.98, NNF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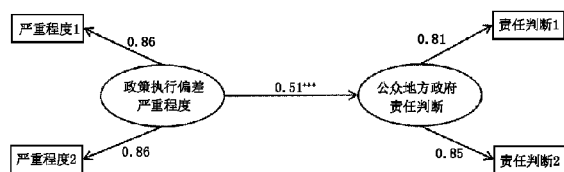


图2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

0.97,  $RMSEA=0.06, SRMR=0.07$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gamma=0.23, t=3.48, p<0.001$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 $\gamma=0.55, t=10.94, p<0.001$ );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能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gamma=0.23, t=3.80, p<0.001$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95% 的区间为[0.059, 0.181]。因此,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量为 0.237。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 $\gamma=0.47, t=7.95, p<0.001$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能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gamma=0.39, t=5.22, p<0.001$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95% 的区间为[0.093, 0.261]。因此,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量为 0.346。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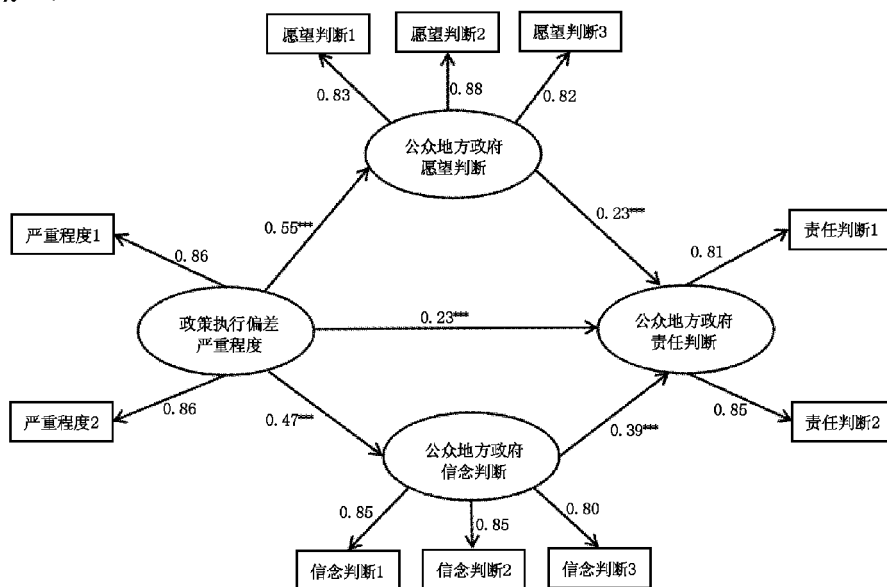


图3 多重中介模型

表2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和效应量

路径	效应值	区间(95%)	效应量
直接路径			
严重程度→ 责任判断	0.225		
中介路径			
严重程度→愿望判 断→责任判断	0.128	[0.058, 0.181]	0.237
严重程度→信念判 断→责任判断	0.187	[0.093, 0.261]	0.346
总中介效应	0.315		0.583
总效应	0.54		

#### 4 讨论

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对行为主体愿望和信念的判断影响人们的道德责任判断。Nobes, Panagiotaki 和 Pawson (2009)研究发现,与疏忽造成有害结果的中性愿望相比,对行为主体故意造成有害结果的消极愿望判断使得人们增大对行为主体道德责任和应受惩罚的判断。Lagnado 和 Channon (2008)认为与不能预见有害结果的中性信念判断相比,当行为主体被认为能预见有害结果的消极信念时,人们会判定行为主体对有害结果具有更大的道德责任,应当承担更严厉的责备和惩罚。根据 Alicke (2000) 的有罪控制模型 (Culpable Control Model), 人们在进行责任判断时会对行为主体的控制性信息进行仔细检查。行为主体的控制性信息主要包括三个: 因果控制 (因果性)、行为控制 (愿望) 和结果控制 (信念); 人们在对行为主体控制性进行检查的同时人们也对结果信息等自动的自发性评估 (Spontaneous evaluation), 自发性评估会改变人们对行为主体的控制性信息的判断并最终影响人们对行为的责任判断。结果越严重, 人们越会在自发评估的作用下提高行为主体的行为控制和结果控制, 认为行为主体具有消极的愿望和信念, 通过消极愿望和信念的作用提高行为主体责任判断。因此在地方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可以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的中介作用影响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

研究还发现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要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Cushman (2008) 发现愿望和信念在道德判断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 两者引发的变异在道德责任判断的总变异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13% 和 50%, 信念在道德责任

判断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愿望所起的作用。Malle 等人 (2014) 的责备理论认为人们的道德责任判断存在行为主体有意性 (有消极愿望) 和行为主体无意性 (无消极愿望) 这两条加工路径。对行为主体的信念 (预见性) 的判断在两条加工路径中都具均具有重要作用。在行为主体具有阻止有害结果的义务情况下, 行为主体信念判断在道德责任判断的作用要大于行为主体愿望判断所起的作用。在地方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当然会认为地方政府具有阻止政策执行偏差所带来的有害结果的义务。因此,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要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整体而言, 研究通过对一个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探讨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如何”影响公众的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结果验证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的中介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多重中介模型。研究结果对于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由政策执行偏差所引发的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地方政府在应对由政策执行偏差引发的危机时应努力向公众释放善意, 除了要使公众认为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偏差中并不具有消极的愿望之外更应当使公众认为地方政府不能预见到消极的后果。引导公众认为地方政府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减轻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责任判断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道德义愤和对抗行为。

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 用横断研究探讨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可能不能反映最真实的情况, 今后研究应该结合纵向追踪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其次, 数据均采用集体施测的自我报告法获取, 以后可采用实验法、个别访谈法等办法收集数据。

#### 5 结论

(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2)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 参考文献

- 丁煌. (2002). 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阻滞及其防治对策的制度分析. 政治学研究, (1), 28-39.
- 段蕾, 莫书亮, 范翠英, 刘华山. (2012). 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的作用: 兼对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

- 论的检验. *心理学报*, 44(12), 1607 – 1617.
- 方杰, 温忠麟, 张敏强, 孙配贞. (201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科学*, 37(3), 735 – 741.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 – 745.
- 徐彪. (2014). 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 and 情景实验. *公共管理学报*, 11(2), 27 – 38.
- 徐彪, 陆湾湾, 刘晓蓉, 张浩. (2016). 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9(6), 144 – 163.
-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 – 950.
- Alicke, M. D. (2000). Culpable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y of bla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4), 556 – 575.
- Campbell, M. C. (1999). Perceptions of price unfairnes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6(2), 187 – 199.
- Cushman, F. (2008). Crime and punishment: Distinguishing the roles of causal and intentional analyses i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08, 353 – 380.
- Fincham, F. (1982). Moral judg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usal schem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1), 47 – 61.
- Flavell, J. H. (2000).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knowledge about the mental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4(1), 15 – 23.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 Lagnado, D. A., & Channon, S. (2008). Judgments of cause and blame: The effects of intentionality and foreseeability. *Cognition*, 108(3), 754 – 770.
- Lange, D., & Washburn, N. T. (2012). Understanding attribu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7(2), 300 – 326.
- Laurent, S. M., Nuñez, N. L., & Schweitzer, K. A. (2015). The influence of desire and knowledge on perception of each other and related mental states, and different mechanisms for bla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0, 27 – 38.
- Malle, B. F., Guglielmo, S., & Monroe, A. E. (2014). A theory of blame. *Psychological Inquiry*, 25(2), 147 – 186.
- Malle, B. F., & Nelson, S. E. (2003). Judgingmens rea: The tension between folk concepts and legal concepts of intentionality.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21, 563 – 580.
- Mazzocco, P. J., Alicke, M. D., & Davis, T. L. (2004). On the robustness of outcome bias: No constraint by prior culpability.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6(2–3), 131 – 146.
- Nobes, G., Panagiotaki, G., & Pawson, C. (2009). The influence of negligence, intention, and outcome on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04(4), 382 – 397.
- Weiner, B. (2000).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theories of motivation from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2(1), 1 – 14.

##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on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Evidence from Multiple Mediating Model

Zhou Yun<sup>1,2</sup>, Liu Jianping<sup>1</sup>, Zhu Hai<sup>2</sup>, Mei Yun<sup>1</sup>

(1.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2. School of Education,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563006)

**Abstract:** In order to discuss how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affects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678 citizens from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adopts 4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questionnaire on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questionnaire on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desire, questionnaire on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belief and questionnaires on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about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Mplus software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1)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situation,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desire and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belief play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for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and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2) the mediating effect size of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belief for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and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desire.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desir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belief; multiple mediating model